

群体内疚：界定、心理机制、行动倾向及干预策略*

殷融¹ 张菲菲¹ 王元元¹ 许志红²

(¹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 (² 浙江传媒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当个体认为内群体为外群体受到的不道德伤害负有责任时会体验到群体内疚。该情绪常见的触发情境包括过往历史的伤害事件、当下的群际冲突、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及未来的伤害事件。群体认同、内群体责任和不当性评估是影响群体内疚产生的三大心理机制。群体内疚会导致施害群体对受害群体表现出积极行动, 如友善态度, 冲突和解、群体补偿及群际支持。通过群体肯定、自我肯定、促进共同认同、强调内群体责任及展现已有补偿行为等干预策略可以引发施害群体的群体内疚。未来的研究应澄清群体内疚的成因机制, 进一步探索群体内疚与补偿行为间的作用关系。

关键词 群体内疚; 群体认同; 群体肯定; 群体情绪
分类号 B842; C913

在社会人际交往中, 个体感知他人的言行后会产生情绪, 而情绪则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态度及行为反应。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 情绪不仅存在于个体水平, 同时也存在于群体水平。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 Smith, 1993)整合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 Turner, 1979)和情绪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ies of Emotions, Lazarus, 1991)的观点, 认为当个体认同其某一社会群体身份、将自己与群体整合为一个有机体时, 会从内群体的视角出发评价和解释与该群体相关的事件,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s)。群体情绪不同于个体情绪, 即便某些影响群体的事件实际并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如果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较强, 他们还是会因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而产生特定的群体情绪体验(Smith, Seger, & Mackie, 2007), 特定的群体情绪会引发导致相应的行动倾向, 调节个体对内、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例如, 个体会因内群体成员遭遇的歧视而感到愤怒(anger), 进而为群体利益进行抗争, 也会因内群体成员的不当行

为而感到羞愧(shame), 进而采取补救措施。

在社会群际关系中, 群体内疚(collective guilt)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群体情绪类型, 该情绪会对群际冲突、群体道歉、群体宽恕、群际和解、群际补偿等群体间的互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近20年心理学家针对群体内疚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 积累了众多研究成果。本文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介绍, 系统梳理群体内疚的心理影响机制及行为结果, 总结群体内疚的干预方式, 并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述与展望。

1 群体内疚的界定

1.1 群体内疚的基本定义

内疚是一种人类最为普遍的道德情绪。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做了某种违背道德或伤害他人的事情后, 便会产生内疚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反应。根据内疚产生的情境和个体归因等条件的不同, 内疚可划分为人际内疚、替代内疚、虚拟内疚和群体内疚等(张琨, 方平, 姜媛, 于悦, 欧阳恒磊, 2014)。其中, 群体内疚是人们在其所属内群体对外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时, 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体验到的一种伴随痛苦、自责的消极情绪。群体内疚并不是个体内疚在群体水平的简单延伸, 其发生机制与个体内疚有很大不同。综合已有研究, 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群体内疚的具体内涵:

收稿日期: 2016-08-09

*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DJYJ04)、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DIA150304)资助。

通讯作者: 殷融, E-mail: yorkns@sina.cn

第一, 由于内群体的道德水平会为群体成员所共享, 因此, 当自己所属群体做出了不道德行为时, 只要个体将自己归类为内群体成员, 即便自己没有参与不道德行动也会产生群体内疚, 群体内疚产生的关键是个体对社会身份的认同, 而不是自己的实际行为(Ferguson & Branscombe, 2014);

第二, 尽管群体内疚是一种群体层面的道德情绪, 但该情绪的产生依然由个人道德标准决定, 例如, 即使大多数群体成员认为某种集体行为是正当的, 但如果个体认为群体行为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 也会产生群体内疚体验;

第三, 在情感体验方面, 群体内疚与个体内疚类似, 当个体感受到群体内疚时会产生伴随着自责、反省、焦虑、痛苦在内的不愉快体验(石伟, 闫现洋, 刘杰, 2011);

第四, 为了消除群体内疚感, 个体会针对内疚的诱发事件采取群体层面的补偿行动, 与个体内疚不同的是, 群体内疚指向的补偿对象并不一定是直接受害者, 而是与受害者具有共同身份的外群体。因此, 尽管群体内疚是一种不愉悦的情绪状态, 但它会导致积极的社会结果(Ferguson & Branscombe, 2014)。

1.2 群体内疚与其他情绪的区分

当判断内群体对外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时, 除了内疚, 群体成员还可能体验到羞愧、愤怒与同情(sympathy)等情绪, 这些情绪类型与内疚既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同时也有所区别。

在情绪研究领域, 羞愧与内疚是一对较难区分的概念, 群体羞愧与群体内疚在诱发情景、情感体验及行为表现方面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研究者对美军入侵伊拉克、以色列伤害巴勒斯坦平民、加拿大对土著的不公平政策等事件进行的研究发现, 当个体承认内群体对外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时, 会同时体验到羞愧感与内疚感, 且这两种情绪会引发群体成员一致的行为, 如道歉、补偿、援助等(Gunn & Wilson, 2011; Sharvit, Brambilla, Babush, & Colucci, 2015; Sullivan, Landau, Branscombe, Rothschild, & Cronin, 2013)。不同的是, 群体内疚只是意味着内群体某些不良行为对外群体造成了伤害, 群体成员会针对这些过错进行反省及补偿, 但对内群体的整体认同不会受到影响; 而群体羞愧则意味着内群体不良行为对自身名誉也造成了伤害, 群体成员会因自己的群体

身份产生被贬低感, 因此, 他们可能还会表现出逃避反应, 降低对内群体的认同, 甚至选择否认群体成员身份(Gausel, 2012; Pivetti, Camodeca, & Rapino, 2016)。

另外, 当个体面对内群体过错时, 可能还会产生愤怒情绪反应, 研究者对殖民战争(Figueiredo, Doosje, & Valentim, 2015; Figueiredo, Valenti, & Doosje, 2015)、不公平教育政策(Shepherd, Spears, & Manstead, 2013)等事件进行的研究发现, 群体愤怒与群体内疚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且这两类情绪都会引发群体成员对受害群体进行补偿或援助的行为意向。不同的是, 群体内疚主要指向外群体, 个体是因为他人受到内群体的不正当伤害而心怀内疚; 群体愤怒则是指向内群体, 个体是因为内群体某些成员的行为违反了社会规则并损害群体形象而感到愤怒。因此, 群体愤怒还可能导致群体成员对不当行为的责任者进行惩罚(Harth, Leach, & Kessler, 2013)。

同情是个体以他人的视角来理解其不幸处境、并对对方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状态。研究发现, 即便在群际冲突背景下, 个体还是经常会对对立群体所受到的伤害感到同情。同情与内疚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可以一致预测群体成员对受害群体的亲善态度、补偿动机及援助行为(Harth, Kessler, & Leach, 2008; Kahn, Liberman, Halperin, & Ross, 2016)。有所不同的是, 内疚意味着个体认为内群体要为外群体受到的不正当伤害负有责任, 同情则不必然如此。另外, 许多研究认为同情是内疚的基础, 易共情的个体更利他、更爱帮助、更容易体验到内疚(Howell, Turowski, & Buro, 2012)。在群体层面, 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痛苦越同情, 当他们把这种痛苦归因于内群体时就会越容易产生群体内疚。例如, Sullivan等人(2013)对美国人的研究发现, 通过引发被试对伊拉克人民的同情感, 可以使他们对美军入侵伊拉克事件感到更为内疚。

1.3 群体内疚的触发情境

群体内疚多见于过往或当下的群际冲突事件, 其具体的触发情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 过往历史的伤害事件: 当内群体在过往历史上曾对外群体做出某种不道德伤害时, 虽然当下的群体成员与历史上的施害群体(perpetrator group)并不存在实际关联, 且当下群体成员也不

一定会从伤害事件中直接受益,但他们依然可能为此产生内疚感。例如,曾制造种族屠杀、殖民战争、奴隶贸易、种族隔离、土地掠夺等事件的群体会因先人的罪恶而心怀内疚。

第二,当下的群际冲突事件: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群际冲突,尽管冲突双方都会对对方表现出敌对的态度及行为,但如果某一方对对方实施了过度的、不合理的伤害,其群体成员便可能将内群体视为施害群体,并因内群体对外群体的过度伤害而感到内疚。例如,在巴以冲突背景下,以色列公民就可能因大量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受难而产生内疚感。

第三,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当社会中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拥有更多的利益和权力,且这种差异并不正当时,尽管优势群体成员并没有直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他们也会因内群体的不合理优势地位及弱势群体的糟糕境遇而感到内疚。例如,白人、男性、基督教徒可能会因社会上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及宗教歧视等问题而产生内疚体验。

第四,未来的伤害事件:群体成员当下行为的负面后果可能不会直接显现,而是在未来对他人福祉造成损害,因此,当个体认识到内群体为未来发生的伤害行为负有责任时,他们也会体验到群体内疚。例如,如果发达国家人民相信他们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降低未来人类的生活质量,那么他们就会为此感到内疚。

2 群体内疚产生的心理机制

个体首先要将自己归类为施害群体成员,且认为内群体对外群体受到的不正当伤害负有责任时才会产生群体内疚感。因此,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内群体责任(ingroup responsibility)及行为不当性(behavior illegitimacy)是影响群体内疚的三种最重要的心理机制。

2.1 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个体将群体成员身份整合进自我概念的程度。根据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个体会自动地将人进行社会分类,并明确自己所属的群体,以所属群体身份定义自我(Tajfel & Turner, 1979)。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越高,自我概念中的群体性与社会性越发凸显,就会越

倾向于以群体成员的身份行事,并基于群体成员的身份对群体相关事件进行评价。因此,当涉及到群际冲突或群际伤害事件时,个体只有将自己归类为施害群体中的一员,才会更容易因内群体的过错而体验到群体内疚感,从这一角度看,群体认同与群体内疚具有正向关系。该假设得到大量研究支持,例如, Jelić, Biruski 和 Ajduković (2013)对克罗地亚人进行的研究发现,被试对克罗地亚的民族认同可以显著预测他们因内群体在南斯拉夫内战时不当行动而产生的群体内疚。

尽管将施害群体视为内群体是引发群体内疚的必要条件,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群体认同对群体内疚存在负向影响作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群体认同源自于人类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的动机,即个体希望通过群体间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来肯定内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优势,从而获得自尊提升(Hogg, 2000)。因此群体成员有维护群体正面形象的需要,而消极的评价及群体价值贬损则会对成员的群体认同产生威胁。由此可见,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越高,越容易产生维持积极群体认同的防御机制,因内群体过失而体验到的内疚感也就越低(Solomatina & Austers, 2014)。例如, Sharvit 等人(2015)对美国及以色列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被试在观看内群体做出的不道德举动后(美国司法人员刑讯恐怖分子、以色列士兵伤害巴勒斯坦平民),他们对内群体(美国、以色列)的认同感与内疚体验间具有负相关的关系。

针对这种研究结论分歧, Klein, Licata 和 Pierucci (2011)指出,可能群体认同对群体内疚并不具有线性而是倒“U”型的作用关系。当群体认同水平较低时,随着个体对内群体认同的提高,他们会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群体中的一份子,因此会更容易为群体过失承担责任,此时群体认同可以促进群体内疚体验;而当群体认同水平较高时,随着个体对内群体认同的提高,他们维护积极群体认同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因此会对群体有关的负面信息有更强的否定倾向,此时群体认同则会阻碍群体内疚体验。研究者对比利时人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设,研究发现,被试对比利时的群体认同与他们因殖民政策而产生的内疚情绪间具有倒 U 型关系,相比高认同及低认同者,中等认同程度的被试会对前殖民地刚果有更强的内疚感。

Roccas, Klar 和 Liviatan (2006)对群体认同与群体内疚间的关系提出过另一种解释。研究者认为,之所以认同对群体内疚的作用方向存在争议,是因为群体认同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维概念,其不同成分会对群体成员的内疚体验产生不同影响。Roccas 等人(2006)特别分析了内群体依恋(ingroup attachment)与内群体赞颂(ingroup glorification)的作用差异,这两种成分分别对应了群体认同满足个体归属感及自尊的功能。其中,内群体依恋反映了个体与内群体心理联系的紧密程度,由于内群体依恋会导致个体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与群体过失有关,因此该因素对群体内疚有基础动员作用;相反,内群体赞颂反映了个体认为内群体优于外群体的水平,由于内群体赞颂会导致个体更倾向于否认与内群体负面印象相关的信息,因此,该因素对群体内疚具有阻碍作用。该假设也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例如, Roccas 等人(2006)对以色列被试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巴以冲突背景下,被试的内群体依恋水平对群体内疚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内群体赞颂水平则对群体内疚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Figueiredo, Valentim 和 Doosje (2011)对葡萄牙大学生的研究显示,被试对葡萄牙的内群体赞颂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否认葡萄牙在殖民地的暴行,他们会更多强调殖民战争的积极意义,否认殖民政策对当地人民的伤害。Solomatina 和 Austers (2014)对犹太人进行的研究也发现,被试的内群体赞颂水平与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内疚感间具有负相关性的关系。

另外,个体不仅会认同内群体,也会对自己身份有关的外群体产生认同。外群体认同反映了个体自我感知的与外群体的心理距离及与外群体成员的亲密关系。当个体对外群体具有较强认同感时,会更关心外群体福祉,更容易为内群体对外群体造成的伤害而感到内疚。研究者对葡萄牙及荷兰大学生被试进行的研究证明,被试对前殖民地人民(非洲与印尼)的外群体认同越强,越倾向于承认殖民政策的罪恶性,并对殖民地人民怀有更强的内疚感(Figueiredo, Doosje, Valentim, & Zebel, 2010; Figueiredo et al., 2011)。

2.2 内群体责任

当个体认为内群体对外群体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时,会更容易体验到群体内疚。例如,研究者曾以早期美洲白人移民对印第安人的政策(Castano

& Giner-Sorolla, 2006)、美国入侵伊拉克(Iyer, Schmader, & Lickel, 2007)、荷兰人纵容波斯尼亚种族大屠杀等事件为背景(Zebel, Zimmermann, Viki, & Doosje, 2008)进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被试越意识到内群体对外群体在历史或当下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他们的群体内疚感受就越强烈。此外,除主动群际伤害外,当社会存在不平等的群际关系时,优势群体的不作为可以被视为另外一种群际伤害。因此,如果优势群体成员认为内群体为弱势群体的不幸境遇负有责任,他们也会为此感到内疚。例如, Leach, Iyer 和 Pedersen (2006)对澳大利亚白人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被试越将土著居民的弱势社会地位归咎于己,他们对土著居民就越感到内疚。

除了已造成的伤害外,当个体认为内群体为未来会发生的伤害行为负有责任时,也会体验到群体内疚。例如, Ferguson 和 Branscombe (2010)在实验中要求被试阅读一篇关于气候变化会对未来美国人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文章,之后告知被试是人类的行为(燃油使用)或自然现象(火山活动)导致了这一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当被试得知气候变化归因于内群体消耗了大量资源时,他们会为美国人过度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感到更为内疚。Harth 等人(2013)对德国被试的研究也发现,凸显内群体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责任,可以提高被试对这一问题的内疚感。Caouette, Wohl 和 Peetz (2012)认为,由于个体一般认为未来事件是可控的,对未来的行动负有更大责任。因此,人们因未来的伤害行为所引发的内疚感甚至要强于因历史已有伤害事件所引发的内疚感。他们在实验中要求加拿大被试阅读一篇关于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报导,其中一部分被试阅读的文章声称该项目在一个月之前淹没了上千英亩的土著人土地,另一部分被试阅读的文章则是声称该项目在一个月后即将淹没上千英亩的土著人土地,研究发现,被试在后一种情况下体验到的群体内疚感要更强,且被试评估的对伤害事件的可控性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

2.3 行为不当性

即使个体认为内群体对外群体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他们还需要将这种伤害视为是不正当的,才会对此心怀内疚。因此,行为不当性评估也是影响群体内疚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显示,群体

成员越认为内群体对外群体做出了不正当的行为,越容易产生内疚体验。例如, Jelić 等(2013)人对南斯拉夫内战后克罗地亚人进行的研究发现, 被试知觉到的内群体行为的不道德性是群体内疚的最重要预测变量。Figueiredo 等(2015)对荷兰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 被试越认为荷兰在对印尼的殖民战争中过于暴力和野蛮, 他们对印尼的内疚感就越强。另外, 当社会上的优势群体认为群际不平等具有不正当性时, 他们也会更容易对弱势群体产生内疚。例如, Bahns 和 Branscombe (2011)实验研究发现, 向异性恋被试呈现抨击同性恋与异性恋社会权利不平等的文章后, 被试会对这种不平等怀有更强的内疚, 而被试对同性恋——异性恋权利差异的不合理评估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Solak, Reifen Tagar, Cohen-Chen, Saguy 和 Halperin (2016)对美国白人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 告知被试黑人对当前种族权益关系仍然很失望会提高他们对黑人的内疚感, 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那些认为种族社会权利差异不合理的被试。

出于维护群体积极道德形象的需要, 群体成员一般具有将内群体不当行为合理化的倾向, 他们会通过否认、歪曲或辩护等方式合理化内群体不当行为, 进而避免群体内疚体验。Sharvit 等(2015)人对意大利人进行的研究就发现, 面对意大利消极的移民政策, 一旦为被试提供某些潜在的辩护借口, 他们都会体验到较低的群体内疚。大量研究发现, 群体认同会影响个体将不当行为合理化的防御机制。例如, Rotella 和 Richeson (2013)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 向被试呈现美洲土著人受到侵害的信息, 施害者被描述为早期美国人(内群体)或欧洲移民(外群体), 之后要求被试完成与侵害信息有关的记忆测试, 以及他们对美洲土著遭到侵害的认知与情感反应。实验结果显示, 当将施害者描述为内群体时, 被试在记忆测试中的成绩更差, 更加轻视土著人所遭遇的伤害, 且以此为中介导致他们的内疚体验也更低。也就是说, 当个体得知内群体对外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后, 出于维护内群体形象的需要, 他们会更容易主动遗忘伤害行为, 并将伤害歪曲最小化。实验还发现, 操纵被试的内群体认同后, 对于低群体认同被试来说, 是否向他们呈现内群体伤害美洲土著的信息并不会改变被试对伤害行为的内疚感, 但对于高群体认同被试来说, 呈现此类信息

反而会减弱他们的内疚感, 这说明, 面对内群体的不当行为, 高群体认同成员会产生更强烈的防御反应。Miron, Branscombe 和 Biernat (2010)的研究也证明了相似效应, 研究者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 测量了他们对美国贩奴历史的看法, 研究发现, 相比低群体认同被试, 高群体认同被试(无论是测量或实验操纵)对内群体不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要更高, 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判定内群体对外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 而更高的判断标准会导致他们更低估黑人群体受伤害的程度, 并因此对黑人群体的内疚感也更弱。这说明, 对于内群体做出的对外群体明显的不道德伤害, 群体成员很难直接否认, 但可以通过提高证据标准、低估伤害程度的方式降低对这些行动的不当性评估。

除群体认同外, 内群体受害也会影响群体成员将不当行为合理化的倾向。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 受害身份具有道德许可的作用, 内群体当前面临的群际威胁可以作为为其不正当伤害辩护的借口。Wohl 和 Branscombe (2008)研究发现, 唤醒群体成员内群体受害的历史遭遇后, 他们会更容易将对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视为应对威胁的正常反应, 因此内疚水平也会较低。Sullivan, Landau, Branscombe 和 Rothschild (2012)指出, 当群体间存在冲突或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时, 所有的相关群体都会进入一种“竞争受害(competitive victimhood)”模式, 个体会认为自己所在群体才是群际冲突或不平等关系的受害者, 他们会夸大内群体的损失, 指控外群体的暴行, 并以此为借口合理化内群体的优势地位及对外群体的不当伤害。例如, Sullivan 等人(2012)对白人男性等优势群体进行的研究发现, 如果明确告知被试弱势群体(黑人与女性)的困境是由优势群体所导致的, 被试会产生强烈的竞争受害思维, 他们会更倾向于认为内群体也受到了歧视或不公正对待。另外, 研究者对美国青年人进行的研究发现, 当告知被试年轻人在社会权力及收入方面比老年人更处劣势时, 被试因老年人受年轻人歧视事件而产生的群体内疚也会降低。这些研究都说明, 内群体受害可以通过对不当行为的合理性评估而影响群体内疚体验。

另外, 除群体认同、内群体责任及行为不当性这三大变量外, 补偿困难、价值观、群体类别化等因素也会影响到群体内疚的产生, 国内学者曾对此进行介绍(石伟, 闫现洋, 刘杰, 2011)。

3 群体内疚的行动倾向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 特定的情绪会引发特定的行动倾向。群体内疚是由消极道德事件所导致的负性情绪体验, 但它会对施害群体成员的道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群体成员会通过受害群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以减少负面情绪感受、补救内群体的道德名誉、修复对内群体的道德认同感, 同时改善与受害群体的群际关系。

3.1 友善态度

群体内疚会导致施害群体对受害者表现出更积极友善的态度, 包括减少偏见、增加接触意愿、宽恕伤害、承认过失、释放歉意等, 这些积极态度的表达可以消除施害群体的负面感受, 并有利于修补消极的群际关系。例如, Stewart, Latu, Branscombe 和 Denney (2010) 研究发现, 美国白人因历史上对黑人的种种不公政策而产生的内疚感可以降低他们对黑人的偏见, 提高他们与黑人群体进行积极群际接触的意愿。Myers, Hewstone 和 Cairns (2009) 对北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间宗教冲突事件进行的研究发现, 被试对对立群体的内疚感越强, 越愿意去原谅对方曾对内群体做出的伤害。Wohl, Matheson, Branscombe 和 Anisman (2013) 对加拿大白人的研究则证明, 被试因历史上曾向华人征收人头税而产生的内疚感可以预测他们对加拿大华裔的道歉态度, 而内疚感越强, 被试越希望道歉可以改善白人与华人的群际关系。

3.2 冲突和解

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群际冲突, 群体内疚则有利于消除群体间的仇视与敌意, 促进群际妥协与和解。例如, Solomatina 和 Austers (2014) 对犹太人进行的研究发现, 被试因巴以冲突中以方暴力行动而产生的内疚感越强, 同巴基斯坦进行和平谈判的意愿就越强烈, 并越不赞同继续使用敌对策略。Leonard, Yung 和 Cairns (2015) 以北爱尔兰天主教及新教教徒为被试进行的研究证明, 被试因伤害外群体(对立教派)而产生的群体内疚可以预测与外群体进行和解与妥协的意愿。Kahn 等人 (2016) 研究也证明, 在看到巴勒斯坦人悲惨现状的信息后, 以色列人越感到内疚, 他们对巴方的信任就越高, 同时越支持同巴方进行协商与调解。

3.3 群体补偿

当群体成员因内疚群体对外群体的不当伤害而

心怀内疚情感时, 他们不但会对外群体表现出积极友善态度, 还愿意付出经济代价补偿外群体。例如, Gunn 和 Wilson (2011) 对加拿大人研究发现, 通过实验操作引发被试对加拿大土著人的内疚感后, 被试会对补偿土著人持更高的支持态度。Mashuri 和 Zaduqisti (2014) 对印尼逊尼派穆斯林教徒(印尼的多数优势群体)的研究发现, 被试因印尼阿玛迪派和什叶派不公待遇而产生的内疚感越强, 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阿玛迪派和什叶派穆斯林进行补偿和援助。

此外, 某些群体不当行为并不会涉及到非常明确的补偿对象, 如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 然而, 群体成员因此类过失而体验到的群体内疚也会促使他们采取积极的补救行动。例如, Ferguson 和 Branscombe (2010) 实验证明, 引发被试因排放温室气体而体验到的内疚感, 会导致他们更愿意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过程。Pensini 和 Caltabiano (2012) 对澳大利亚人的研究发现, 被试因发达国家过量使用资源破坏环境而产生的内疚感可以显著预测他们对垃圾回收利用的态度。Harth 等人 (2013) 对德国被试进行的实验也证明, 通过实验操纵提高被试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内疚感, 会导致被试有更强的意愿去补救对环境造成的伤害。

3.4 群际支持

当社会上存在不公正的社会关系时, 优势群体成员因此体验到的内疚感还会驱使他们支持或参与为弱势群体争取利益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例如, Shepherd 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 当假设英国教育部门会对威尔士留学生提高学费时, 英国的大学生(优势内群体)针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内疚情绪可以预测他们参与抗议活动的意愿。Paladino, Zaniboni, Fasoli, Vaes 和 Volpato (2014) 以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对女性的侮辱歧视事件为背景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男性对女性的内疚可以预测他们参与反性别歧视活动的意愿。此外, Solak 等人(2016)的研究也发现, 以色列被试对巴勒斯坦人的内疚感可以预测他们是否愿参与反对入侵加沙地区的集体行动, 而白人被试对黑人的群体内疚感可以预测他们是否愿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体行动。

4 群体内疚的干预方式

群体内疚的表达可以增加群体间的友好态度,

引导良性的群际互动;相反,否认或歪曲内群体过失则可能进一步激怒外群体,导致群际冲突升级。例如,中日之间时常因为日本在教科书中美化侵华战争而变得关系紧张;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之间也因为土耳其否认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大屠杀而冲突不断。鉴于群体内疚对群际关系的积极促进作用,探讨如何在群际冲突中对群体内疚进行有效干预与介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群体内疚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提升群体内疚、解决群际矛盾提供了参考依据。

4.1 群体肯定与自我肯定

群体成员之所以会否认内群体过失,推卸内群体在不道德伤害中的责任,主要原因在于承认群体过错会对群体道德形象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通过群体肯定(group affirmation)凸显内群体的积极特质或成就,满足群体成员维护积极群体认同的需要,就可以减弱他们的认同防御机制,增强他们对内群体不道德事件的内疚感受。例如, Gunn 和 Wilson (2011)对男性及加拿大人进行的研究发现,向被试凸显内群体的积极特质,可以使被试对性别歧视及加拿大土著人的遭遇更感到内疚。Miron 等人(2010)研究发现,要求被试描述美国历史上有正面意义的事件,可以降低他们对内群体不道德行为的判定标准,提高他们对贩奴事件不道德性的评估,并进而引发他们对黑人更强的内疚感。Schori-Eyal, Tagar, Saguy 和 Halperin (2015)实验发现,对于具有高群体赞颂倾向的以色列被试,相比观看以色列军事防御能力受到质疑的文章(低群体自豪),他们在观看以色列军事防御能力受到赞誉的文章(高群体自豪)后,会对伤害巴勒斯坦平民有更强的群体内疚。另外, Čehajić-Clancy, Effron, Halperin, Liberman 和 Ross (2011)的研究证明自我确认(self affirmation)也具有引发群体内疚的效应。研究者对以色列犹太人及波黑塞尔维亚人进行的实验证明,被试在自我肯定的情况下(回忆自己的成功经历),会将内群体在巴以冲突及南斯拉夫内战中的错误视为更不道德的,并因此导致他们对外群体有更强的内疚感。

4.2 凸显施害群体的补偿行为

对于施害群体来说,直接谴责其不当行为可能并不会引发群体内疚,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然而,如果施害群体已经为不道德伤害做出某些补偿,凸显补偿相关信息却可以提升其他群体成员

的内疚体验。因为已有的补偿行为说明内群体已经为挽回过失做出了积极努力,这会降低群体成员维护内群体形象的需求,导致群体成员更可以承认内群体在历史上的过错。例如, Peetz, Gunn 和 Wilson (2010)对德国人进行研究发现,被试会通过将纳粹大屠杀描述为遥远历史事件的方式,弱化当代德国在其中的责任,避免群体内疚体验。但如果向被试表明德国已经为大屠杀做出了补偿及道歉,被试则会更加重视大屠杀事件,并因此对受害群体怀有更强的内疚感。Lastrego 和 Licata (2010)对比利时人进行的研究也证明了类似效应,研究者发现,相比不呈现比利时政府向原殖民地刚果道歉及补偿的相关信息,向被试呈现此类信息后,他们会因曾经的殖民战争及殖民政策产生更强的内疚感。

4.3 唤醒共同认同

共同认同(common identity)指的是个体对包摄水平更高的群体身份的认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社会身份,而不同的群体身份间可能会具有上下包摄关系,如“藏族人”、“汉族人”等群体身份就从属于“中国人”这一群体身份。根据 Gaertner 和 Dovidio (2012)提出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当个体将原来两个分离群体的认知表征改变为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superordinate group)时(例如,由“藏族人”与“汉族人”这样的认知表征改变为“中国人”的认知表征),个体会以共同身份的方式重新界定内外群体,共同认同得以凸显,此时原本存在的内外群体的边界会弱化,个体会认识到与外群体成员属于范围更大的共同体,群际关系便会得以缓解。因此,向施害群体凸显他们与受害群体同属于一个上位群体,可以拉近他们与受害群体的心理距离,减轻他们对受害群体的偏见、不满及敌意,进而提高他们对受害群体的群体内疚。例如, Mashuri 和 Zaduqisti (2014)对印尼逊尼派穆斯林教徒(印尼的多数优势群体)的研究发现,被试对“印尼”这一上位群体的认同感越强,对阿玛迪派和什叶派在印尼的不公遭遇就怀有更强的内疚感,并越倾向于认为政府应该对这些少数教派进行援助。

4.4 强调内群体责任

即便意识到社会存在不平等的群际关系,优势群体成员也只有在将弱势群体的遭遇归咎于己

时才会心怀内疚。因此,强调内群体在群际不公中的责任也具有引发群体内疚的作用。

Stewart 等人(2010)证明过这一效应,研究者在实验中告知白人学生当前教育系统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优待白人歧视黑人),之后通过实验操纵使一部分被试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群体努力消除这种不平等,使另一部分被试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之后测量被试是否会因教育资源种族分配不公而感到内疚,实验结果显示,如果被试认为内群体可以通过联合行动改善这一现状,那么他们的内疚感会较强,反之则较弱。也就是说,通过使优势群体成员认识到他们对解决弱势群体困境负有的责任,会导致他们有更强的群体内疚体验。此外, Saguy, Chernyak-Hai, Andrighetto 和 Bryson (2013)以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平等社会关系为背景进行的研究发现,当犹太被试被错误的指控具有种族偏见时,他们会将内群体相对于外群体的优势地位视为更加合理的,并更不愿支持弱势群体进行抗争。这是因为在被错怪的情况下优势群体成员会认为导致群际不平等关系的责任不在于内群体,因此他们也无意为改善外群体境况而作出努力。

4.5 关注内群体伤害

在群际冲突背景下,受“竞争被害”心理机制的影响,群体成员会将内群体受害作为为己方不道德行动辩护的借口。然而,内群体受害并不一定总是群体内疚的障碍。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对抗事件,如果引导群体成员关注内群体所受到的伤害,可能会使他们更容易对外群体的遭遇感同身受,进而对外群体产生更强的内疚感。例如, Penic, Elchereth 和 Spini (2016)对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公民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群际冲突双方具有大致相同程度损伤的情况下,相比于不平衡损伤,内群体对外群体的群体内疚感会更高,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相同的经历可以让内群体更切身的感受外群体的痛苦遭遇,促使群体成员进行反思,因而使他们更能认识到内群体暴行的不道德性。此外, Sullivan 等人(2013)对美国人进行的研究也曾发现,相比于呈现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受损的信息,呈现美国受损的信息会导致被试对美军入侵伊拉克感到更为内疚,而被试所意识到的内群体行为的不道德性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

5 评价与展望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群际冲突及群际不公,因此群体内疚是社会群际互动中一种常见的群体情绪。群体内疚具有化解群际矛盾、修复群际关系、维护群际和谐及推动群际公平的积极作用,对该现象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研究者已初步阐明了群体内疚的心理触发机制,分析了群体内疚的行动倾向,探索了群体内疚的干预方式,获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然而,该研究领域仍有一些问题亟待澄清,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群体内疚产生的内在机制仍然存疑。尽管研究者现在已基本可以确定影响群体内疚的一系列前因变量,但对于其具体的微观成因机制目前依然缺乏确定性结论。群体成员内疚及补偿意愿的产生存在几种可能性:第一,维护群体形象,挽回内群体名誉;第二,出于赎罪心理,弥补对外群体的伤害;第三,维持积极的道德自我认同,通过内疚的表达将自己与不道德群体成员相区别。也就是说,群体内疚的三大前因变量(群体认同、群体责任、行为不当性评估)与群体内疚之间可能还存在关键性中介变量,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探讨群体内疚的成因机制。

其次,尽管大量研究都证明群体内疚可以提高施害群体对补偿政策的支持,但也有研究发现内疚与补偿间的关系并不必然如此。例如, Dumont 和 Walczus (2014)对南非白人进行的研究发现,群体内疚对补偿意愿的作用会受到当下群际权利关系的调节,如果被试认为内群体已丧失了优势群体地位,内疚就不再对补偿意愿存在显著预测作用。Klein 等人(2011)对比利时人进行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对比利时的群体认同与他们因殖民政政策而产生的内疚情绪间具有倒 U 型关系,但群体认同与补偿意愿间则具有边缘递减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被试的内群体认同及群体内疚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他们对补偿政策的支持度却最高。这说明,群体内疚与补偿意愿间的关系还会受到多种其他变量的调节。另外,当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都是群体内疚对补偿行为的影响,但补偿行为是否会对群体内疚及其前因心理机制产生影响?目前未有研究涉及这一问题,一方面,

补偿行为可能通过建立积极群体形象而减轻群体内疚,但也可能通过强化群体成员对内群体过失的认识而提高群体内疚,且补偿行为还可能会对群体认同、群体责任等因素产生反馈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综合考虑群体内疚、群体认同、补偿意愿及其他变量间复杂的作用关系及循环影响机制。

再者,在群体内疚的干预措施方面,目前有价值的干预策略依然比较有限。当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群体内疚的影响因素,即群体认同、群体责任、行为不当性评估而开展的,实际上很多群体互动因素都可能会对群体内疚产生影响。例如,大量研究证明,群际接触可以增强群体间的互谅、信任与包容,减少群际偏见与冲突(艾娟, 2016),因此,与受害群体高质量的群际接触可能会诱发施害群体更强烈的内疚感;再如,受群体规范及群体压力的影响,个体在态度、行为甚至情绪感受上都会表现出与其他群体成员的趋同模式(Blackwood & Louis, 2012),因此,凸显内群体成员的内疚体验可能会对其他成员的内疚感产生同化作用。未来研究需要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进一步挖掘干预群体内疚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 艾娟. (2016). 扩展群际接触: 观点、机制与展望. *心理科学进展*, 24, 836–843.
- 石伟, 闫现洋, 刘杰. (2011). 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情绪反应——群体内疚. *心理科学进展*, 19, 224–232.
- 张琨, 方平, 姜媛, 于悦, 欧阳恒磊. (2014). 道德视野下的内疚. *心理科学进展*, 22, 1628–1636.
- Bahns, A. J., & Branscombe, N. R. (2011). Effects of legitimiz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s on gay bas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388–396.
- Blackwood, L. M., & Louis, W. R. (2012). If it matters for the group then it matters to me: Collective action outcomes for seasoned activis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72–92.
- Caouette, J., Wohl, M. J. A., & Peetz, J. (2012). The future weighs heavier than the past: Collective guilt, perceived control and the influence of tim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363–371.
- Castano, E., & Giner-Sorolla, R. (2006). Not quite human: Infrhumanization in response to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group kill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804–818.
- Čehajić-Clancy, S., Effron, D. A., Halperin, E., Liberman, V., & Ross, L. D. (2011). Affirmation, acknowledgment of in-group responsibility, group-based guilt, and support for reparative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256–270.
- Dumont, K., & Walczus, S. (2014). Group-based guilt and repa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4, 331–341.
- Ferguson, M. A., & Branscombe, N. R. (2010). Collective guilt mediates the effect of beliefs about global warming on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itiga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135–142.
- Ferguson, M. A., & Branscombe, N. R. (2014).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guilt. In C. von Scheve & M. Salmela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pp. 251–265).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gueiredo, A. M., Doosje, B., & Valentim, J. P. (2015). Group-based compunction and anger: Their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in relation to colonia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9, 91–105.
- Figueiredo, A. M., Doosje, B., Valentim, J. P., & Zebel, S. (2010). Dealing with past colonial conflicts: How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ctimized outgroup can influence the experience of group-based gui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4, 89–105.
- Figueiredo, A. M., Valenti, J. P., & Doosje, B. (2015). Too long to compensate? Time perceptions, emotions, and compensation for colonial conflict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1, 500–504.
- Figueiredo, A. M., Valentim, J. P., & Doosje, B. (2011). A shared past and a common future: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war and the dynamics of group-based guilt.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 163–171.
-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2012).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439–45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ausel, N. (2012). Facing in-group immorality: Differentiating expressed shame from expressed guilt.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4, doi: 10.5539/res.v4n4p1.
- Gunn, G. R., & Wilson, A. E. (2011). Acknowledging the skeletons in our closet: The effect of group affirmation on collective guilt, collective shame, and reparatory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 1474–1487.
- Harth, N. S., Kessler, T., & Leach, C. W. (2008). Advantaged group'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intergroup inequality: The dynamics of pride, guilt, and sympathy. *Personality and*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15–129.
- Harth, N. S., Leach, C. W., & Kessler, T. (2013). Guilt, anger, and pride about in-group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Different emotions predict distinct inten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4, 18–26.
- Hogg, M. A. (2000). 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rough self-categorization: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223–255.
- Howell, A. J., Turowski, J. B., & Buro, K. (2012). Guilt, empathy, and apolog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 917–922.
- Iyer, A., Schmader, T., & Lickel, B. (2007). Why individuals protest the perceived transgressions of their country: The role of anger, shame, and guil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572–587.
- Jelić, M., Biruski, D. C., & Ajduković, D. (2013). Predictors of collective guilt after the violent conflict. *Collegium Antropologicum*, 37, 1–10.
- Kahn, D. T., Liberman, V., Halperin, E., & Ross, L. (2016). Intergroup sentiment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esponses to potentially ameliorative proposals in the context of an intractabl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 61–88.
- Klein, O., Licata, L., & Pierucci, S. (2011). Does group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e or prevent collective guilt about past misdeeds? Resolving the paradox.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 563–572.
- Lastrego, S., & Licata, L. (2010). “Should a country's leaders apologize for its past misdeeds?”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both public apologies from a Belgian official and perception of Congolese victims' continued suffering on Belgians' representations of colonial action, support for repar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ngolese. *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25, 61–72.
- Lazarus, R. S. (1991). *Emotion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6). Anger and guilt about ingroup advantage explain the willingness for political 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1232–1245.
- Leonard, M. A., Yung, S. M., & Cairns, E. (2015). Predicting intergroup forgiveness from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guilt in adolescent and adult affiliates of a northern Irish cross-community organization.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1, 155–167.
- Mashuri, A., & Zaduqisti, E. (2014).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emotions as predictors of pro-social attitudes toward Islamic minority groups in Indonesia.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 255–276.
- Miron, A. M., Branscombe, N. R., & Biernat, M. (2010). Motivated shifting of justice standard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768–779.
- Myers, E., Hewstone, M., & Cairns, E. (2009). Impact of conflict on mental health in Northern Irel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nd collective guilt. *Political Psychology*, 30, 269–290.
- Paladino, M. P., Zaniboni, S., Fasoli, F., Vaes, J., & Volpato, C. (2014). Why did Italians protest against Berlusconi's sexist behaviour? The role of sexist belief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in explaining women and men's pathways to protes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3, 201–216.
- Peetz, J., Gunn, G. R., & Wilson, A. E. (2010). Crimes of the past: Defensive temporal distancing in the face of past in-group wrongdo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598–611.
- Penic, S., Elchereth, G., & Spini, D. (2016). When is collective exposure to war events related to more acceptance of collective guil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press.
- Pensini, P. M., & Caltabiano, N. J. (2012). Collective guilt and attitudes toward recycling: Data from a north Queensland sample. *Journal of Tropical Psychology*, 2, 1–7.
- Pivetti, M., Camodeca, M., & Rapino, M. (2016). Shame, guilt, and anger: Their cogni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Current Psychology*, 35, 690–699.
- Roccas, S., Klar, Y., & Liviatan, I. (2006). The paradox of group-based guilt: Mod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onflict vehemence, and reactions to the in-group's moral viol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 698–711.
- Rotella, K. N., & Richeson, J. A. (2013). Motivated to “Forget”: The effects of in-group wrongdoing on memory and collective guil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4, 730–737.
- Saguy, T., Chernyak-Hai, L., Andrighetto, L., & Bryson, J. (2013). When the powerful feels wronged: The legitimization effects of advantaged group members' sense of being accused for harboring racial or ethnic bias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292–298.
- Schori-Eyal, N., Tagar, M. R., Saguy, T., & Halperin, E. (2015). The benefits of group-based pride: Pride can motivate guilt in intergroup conflicts among high glorifi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1, 79–83.
- Sharvit, K., Brambilla, M., Babush, M., & Colucci, F. P. (2015). To feel or not to feel when my group harms others? The regulation of collective guilt as motivated reasoning.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 1223–1235.
- Shepherd, L., Spears, R., & Manstead, A. S. R. (2013). 'This will bring shame on our nation': The role of anticipated group-based emo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42–57.
- Smith, E. R. (1993).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 In D. M. Mackie & 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Interactive processes in group perception* (pp. 297–3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mith, E. R., Seger, C. R., & Mackie, D. M. (2007).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431–446.
- Solak, N., Reifen Tagar, M., Cohen-Chen, S., Saguy, T., & Halperin, E. (2016). Disappointment expression evokes collective guilt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egitimacy perceptions.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press.
- Solomatina, I., & Austers, I. (2014). Collective guilt makes conflicting parties more collaborative: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Psychology Research*, 4, 271–284.
- Stewart, T. L., Latu, I. M., Branscombe, N. R., & Denney, H. T. (2010). Yes we can: Prejudice reduction through seeing (inequality) and believing (in social chan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557–1562.
- Sullivan, D., Landau, M. J., Branscombe, N. R., & Rothschild, Z. K. (2012).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s a response to accusations of ingroup harm do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778–795.
- Sullivan, D., Landau, M. J., Branscombe, N. R., Rothschild, Z. K., & Cronin, T. J. (2013). Self-harm focus leads to greater collective guilt: The case of the U.S.-Iraq conflict. *Political Psychology*, 34, 573–587.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8).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Wohl, M. J. A., & Branscombe, N. R. (2008). Remembering historical victimization: Collective guilt for current ingroup transgres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988–1006.
- Wohl, M. J. A., Matheson, K., Branscombe, N. R., & Anisman, H. (2013). Victim and perpetrator groups' responses t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s apology for the Head Tax on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guilt. *Political Psychology*, 34, 713–729.
- Zebel, S., Zimmermann, A., Viki, G. T., & Doosje, B. (2008). Dehumanization and guilt as distinct but related predictors of support for reparation polic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9, 193–219.

Collective guilt: Defini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ction tendency and interventions

YIN Rong¹; ZHANG Fei-Fei¹; WANG Yuan-Yuan¹; XU Zhi-Hong²

(¹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261061, China)

(²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hen an important ingroup is considered responsible for immorality harm toward outgroup, individuals can experience collective guilt. This kind of emotion can result from past harmful events, current intergroup conflicts, unfair social relations and future harmful events. Group identity, ingroup responsibility and behavior illegitimacy are three key antecedents of collective guilt. Collective guilt could cause members of perpetrator group to perform positive behaviors toward the victimized group, such as friendly attitudes, reconciliations, compensations and intergroup supports. Methods for inducing collective guilt include group affirmation, self affirmation, promoting common identity, highlighting ingroup responsibility, showing existing compensation actions and so 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larify genetic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guil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guilt and repara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guilt; group identity; group affirmation; group-based emotions